



走出西方的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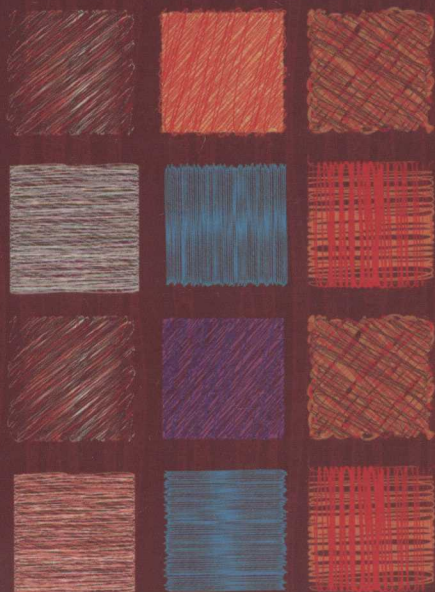
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DES OCCIDENTALISER LA SOCIOLOGIE

L'Europe au miroir de la Chine

〔法〕劳伦斯·罗兰-伯格 著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胡瑜 译



◆ 新社会学文丛 ◆



014038785

C91
253

走出西方的 社会学

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DES OCCIDENTALISER LA SOCIOLOGIE
L'Europe au miroir de la Chine

〔法〕劳伦斯·罗兰-伯格 著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胡瑜 译



C91
253



北航

C172622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西方的社会学：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 (法) 罗兰 (Roulleau - Berger) 著；胡瑜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

(新社会学文丛)

ISBN 978 - 7 - 5097 - 4527 - 4

I. ①走… II. ①罗… ②胡… III. ①社会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409 号

· 新社会学文丛 ·

走出西方的社会学

——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著 者 / [法] 劳伦斯·罗兰 - 伯格

译 者 / 胡 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崔晓璇 刘 芳

郑 嫵

责任校对 / 杜若佳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27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917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8.00 元

印 张 / 5.8

字 数 / 10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航

C1726228

目 录

引言 社会学：走出西方	1
第一章 社会学：跨越国界	7
一 中国和欧洲社会学的发展和现状	7
二 中国社会学：从后殖民到学科重建	10
三 地方理性主义和田野科学	13
四 知识的生产和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就业与劳动	18
一 转型与经济制度	18
二 危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20
三 经济变革与弹性工作	22
四 统治与在劳动力市场上失去资格	25
五 面对“风险社会”的年轻人	27
六 强连带、弱连带与就业	29
七 工作观与代际因素	31
八 经济社会学新问题	34
第三章 社会边界与城市隔离	37
一 新的社会边界与城市隔离	37
二 中国和欧洲的“城中村”	41

三	城市中的污名化和“冷暴力”	43
四	城市与城市空隙带	44
第四章	现代性、主体和对他人的关爱	47
一	现代性与主体	47
二	自主性与自我的考验	49
三	社会不公与为承认而战	53
四	道德经济与对他人的关爱	55
第五章	国家、社会冲突与集体行动	57
一	国家与公民	57
二	中国：诉苦与社会运动	59
三	法国：民主与暴力	62
第六章	不公与个人经历	66
一	社会分层与阶层新边界	66
二	流动和个人经历	69
三	统治与权力	71
第七章	国际人口流动和内部人口流动	73
一	流动政策和权力机器	73
二	流动和歧视	74
三	族群经济据点和家政工作	77
四	人口流动和多中心经济	79
五	流动历程和社会分层	80
结语	后殖民决裂与新的认知视野	83
参考文献		86
鸣谢		112

引言 社会学：走出西方

文化全球化和思想的传播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的特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审视不同的思考方式，探究它们在解读地方社会时如何将地方社会与世界社会相联系。作为近 30 年的重要现象，人口流动积极推动各国非物质经济的重构及其内部的竞争和安排，并使新的等级秩序和组合方式逐渐浮出水面（Sassen, 2006）。人口流动现象多元而复杂，时而可视时而隐形，它们迫使人们愈来愈关注知识的国际性传播及其在“地方层面的国际化”（Tarrius, 2010）。我们需要进入多元认知空间，才能去审视社会，理解旧的知识等级体系如何让位于新的体系，诠释国际和地区间的知识网络如何通过文化和符号的连接和脱裂而得以建立。

在这个世界社会中，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兴趣才刚刚开始。

随着其自身向中国思想的开放，西方思想逐渐发现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视线。由于各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变得不容忽视。1979 年以来得以重建的中国社会学致力于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而这些与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复杂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与欧洲社会学时有交集。西方社会学固然在最初影响过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大环境，但中国社会学家却通过在理论、立场和方法上的建树，与西方思想平行、重合甚至对立，逐步成功地摆脱欧洲思想的束缚。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中，存在多元的理论流派沿袭的同时也不乏独创的理论模式。学者在移植范式和借鉴范式时严守共同的核心原则，

即拒绝民族中心主义立场，抵抗西方思维模式的强势，坚持“语境化”的思维方式——欧洲社会学却几乎无法做到将“外来”思想整合到学科体系内（Blanchot, 2002; Jullien, 2000）。

社会学思想，正如任何其他人文学科思想一样，与见证它诞生的欧洲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Kilani, 2009）。因此，在当代社会多元化过程中，社会这个概念——作为与现代性尤其是欧洲现代性相关的叙事——的确受到了质疑。但尽管如此，西方思想依然将自己视为理解他乡历史（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巴西……）的普世理论依据。社会学思想的发展早已被打上了各种学术殖民主义的烙印。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ïd, 1997）所说：“东方主义是施于东方的西方式统治、再建构和权威……东方主义是——而不仅仅代表——现代政治和学术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与东方的关系淡于它与我们自己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东方主义意味着吉奥乔·阿甘本（Agamben, 2007）所说的多种机制（dispositif）的设立，即“一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截取、塑形、控制和保证人们举止、行为、观点和言论的事物”。但东方主义中的截取是一个高选择性的过程，例如它可以抓住一些“已失去活力”的知识——如古代哲学中的知识——将其纳入并封闭到汉学体系中，却拒绝整合当代的充满生命力的知识。归根到底，问题事实上就是对所谓非西方思想的承认。

由于西方、东方和远东思想体系之间长久以来的统治和等级关系，大面积知识领域遭到遮掩甚至根本不为人所知。西方社会学家未曾接触过像中国那样的遥远国度的叙事，使得其民族中心主义立场不断得到强化。马克思主义也许本来可以在知识传播中起积极作用，这一点其实能更深刻地向我们解释上面这个现象的矛盾性：1949~1979年，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经历了意义非凡的岁月；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所受到的最深刻的影响来自各种马克思主义。但到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各地逐渐被

地方化，分别出现了属于中国和属于欧洲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如何看待当代社会的多元叙事？如何打破殖民主义在东西方社会之间种下的既有等级关系？从事“底层研究”^①的人类学家（Bhabha, 1994）提出“将欧洲省份化”（Chakrabarty, 2000），将“底层历史”完全重置于其特有的背景中去研究，认为不应用欧洲的视角去解读不同的社会背景。此后，各种后殖民研究得以长足发展，其共性是超越现代性的大叙事和社会科学大范式。他们认为（后）殖民具有国际性（Kilani, 2009），认为它是作为“自我的他者”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同时建构在“自身文化内部镜像”和“西方文化外部镜像”之上（Saidi, 2006）。部分中国社会学家（周晓虹, 2010）、人类学家（罗红光, 2008）、亚洲学者（Nakamura, 2009; Pan Inghai, 2009）都赞同这一后殖民姿态，以主体性为出发点思考“自我的他者”。

上述新理论出现之后，再提“知识的省份”的多样性似乎就不如去关注新的（知识）中心地域，更不如去探讨不同知识地带间如何产生连续与脱裂，探讨各地域知识间的联系与断层。这些地带分布于世界各地，有潜力形成兼具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跨国中介空间”。由于能够与霸权思想和帝国思想保持距离（Hardt and Negri, 2000），生产知识的跨国中介空间逐步得以建构，致力于制定共同的知识规范，制定新帝国内外的理论间互相承认的规范。中欧学者就是在这个空间里，为了共同的事业，投身于社科知识的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共同的规范。

我们不赞同“预先制造的文化冲突”（Saïd, 2003）这种理论立场，我们选择另一种视角，它能让我们看到建构于中西方两种社会学之间的交汇、重合和交融。特定的情景、过程和形态固然处于特定的时空，但它们同时告知我们其他空间和时间的存在。全球化过程始终非常活跃，就像费尔南·布罗代尔（Braudel,

① 原文 subaltern studies，又译“庶民研究”。——译者注

1979)证明的那样,它们参与了科学知识的不规律传播,尤其在社科领域。这种态度和方法能让非霸权的、更具普世性的社会学成为可能。这种社会学能海纳百川,吸收来自欧洲、亚洲、阿拉伯、非洲等各种社会对自身的解读(Laplantine, 2007)。

知识传播和全球化运动中形成了新的中心和外围,新等级悄然出现,于是各地开始激烈争抢新型知识的制造权。人文科学知识的制造中心业已转移到亚洲。以欧洲为中心的原教旨主义认为,唯一有能力生产批判思想的认知体系是传统的欧洲体系(Grosfoguel, 2010);同样,方法民族主义将非西方的理论弃之于次要地位或知识郊区。面对上述两种态度,面对“认知种族主义”(Beck, 2006),知识分子,尤以社会学家为最,并非无动于衷。生产于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学知识曾经并且依然被视作是知识郊区地带,即合法性较弱的空间。但这些科学空间探讨的是卡尔·波普(Karl Popper)笔下的“问题”、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笔下的“谜语”,或让-米歇尔·贝特洛(Jean-Michel Berthelot)所说的现象与解释框架间的“不和谐”。“问题”“谜语”或“不和谐”却恰恰体现了某些研究传统对其他方法的统治、遮挡,甚至对涌现于“外部”的思想的打压。

知识分子就在这些遥远不起眼的空间里为承认而战。由于西方的统治,部分理论研究从未进入人们的视线,从未被赋予与西方知识同等的价值,他们就是为这些研究寻找承认而战。近20年来,如何使国际学界承认去殖民性质的知识,已成为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书沿承后殖民研究中去殖民批评的做法,希望成为拉蒙·格若思佛盖尔(Grosfoguel, 2010)所说的“普世性的去殖民新说”运动的一股力量。“社会学知识走出欧洲”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中被提出来的。同时被提出的还有一个新的观点,即去殖民进程在由中国、日本、韩国社会学知识组合交融构成的民族风景(ethnoscape)(Appadurai, 2001)中展开。这些民族风景与欧洲的科学空间接触有限,其内部共享的习惯和规范拒绝服从知识的殖民统治。

传统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纲领与民族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有关。本书的意图就是对这样的学科特征做一次自省。这里，我们将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如何统治并遮盖其他地域理论——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中建构起来的理论；我们更将提出东西方社会学边界渐趋模糊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是被无视或被遗忘的学术文化无声的竞争及其为承认而进行的战斗。

一旦能够走出民族中心主义，学者就能发现世界和社会的多样性，发现每个社会关于自己的不同叙事，就能分析不同的叙事为什么具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一旦尝试摆脱任何形式的方法民族主义（Beck, 2006），就能让西方社会的大叙事超越僵硬的本质主义理论概念，从而打破民族中心主义在特定时空建构起来的学术失衡（Assayag, 2008）。

五年来，就各地社会学及其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与中国社会学家进行了长期的交流和讨论，其中不乏争论。这些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和上海大学。我们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得到他们本人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学家的积极参与。

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丝毫没有在此呈现中国和欧洲社会学全景的宏大野心。我们只是大量参考了部分中国社会学家十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但我们也知道，在广州、天津、西安、南京等地，同样有优秀的社会学家在不懈地创造着新的知识。

此外，由于我们寻求建立“镜像效应”而非全面介绍中法两国学术成就，因此中法两国社会学中的大片领域都未被此书涉及。比如，中国农村社会学自1979年以来就得到无数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研究课题有：农民经济地位的变迁、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社会差异化过程、农民阶层生活方式等。然而类似的研究在西欧社会学里已经不复存在，因为30年来农村问题已经渐渐退出学者视线。反过来说，有关艺术与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可谓是法国学界的重要传统领域，然而在中国它才刚刚起步，因此就无镜

像效应可言。再或者说，近五年来宗教问题在欧洲得到强劲的发展，但在中国类似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学科知识的不对称事实上反映的是地方研究间的差异和个性。

本书将探讨以下六个主题的镜像效应：

就业与劳动；

社会边界与城市隔离；

现代性、主体和对他人的关爱；

国家、社会冲突与集体行动；

不公与个人经历；

国际人口流动和内部人口流动。

其次，我们将尝试在上述主题的研究方式中区分出“特有空间”和“共有空间”。这两种空间形成于特定的学术传统内，受到知识的交流、借用和本土化的影响，但也受到排斥、遗忘，以及时而普世时而特殊的社会学知识的再“输出”的影响。

我们将在中法两国学者用不同方法研究的社会学课题间搭建对话，关注上述两种空间的联系和脱裂，以期找到中国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学之间的“连续的断续”和“断续的连续”。

在第一章中，我们研究的是各地社会学和跨国学术的问题，提出承认不同地域社会学的重要性，并分析中国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社会学家对上文列举主题的不同研究方法。

第一章 社会学：跨越国界

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学，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西方社会学历来都持封闭态度。中国的社会学却恰恰相反，它从发展伊始就充分吸收欧美理论养分，到现在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中国社会学在搬用融合各种范式的同时，始终抵抗西方思想模式对其的强势压制，强调“语境化”思想的重要性。而欧洲社会学却很难以同样开放的姿态去吸纳东方、阿拉伯、非洲等地的外来思想……

一 中国和欧洲社会学的发展和现状

当新思想摆脱东方主义（l'orientalisme）的桎梏而悄然发展时，我们却受制于文化霸权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于是对新思想的萌芽、成长和全部历史一无所知。例如，欧洲大多数学者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学早在 1949 年前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了解社会研究在中国与在欧洲有着同样长的历史（李培林，2008b；Merle，2008；Rouleau-Berger，2008a）。从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起，中国就完成了大量社会调查和研究报告，尤其是 1914 ~ 1915 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完成的对 302 位人力车夫生命历史的大型社会调查（陆学艺，1995 ~ 199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则在 1934 ~ 1935 年对中国南方外来人口进行了一次重要研究。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被奉为 1949 年前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迅猛发展的中国社会学在 1949 年之后却不幸遭禁，长达 30 年之久。这一页空白使得我们找不到与西方社会学同时期的对应，无法做比较。中国社会学直到 1979 年才获得新生，可谓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重大事件。从 1980 年起，社会学家开始重建学科，完成不计其数的研究项目，投身于长期的科学生产过程（Rouleau-Berger, Guo Yuhua, Li Peilin, Liu Shiding, 2008）。

在研究科学性的认定问题上，中国社会学似乎使用多种规范（谢立中，2007，2010），其唯一的条件是科研必须辩证结合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因此形成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主流趋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作用，分析现实情况的社会建构过程，重视个体化现象的出现，摆脱西方对中国思想居高临下的目光，力求建构属于自己的范式。

在欧洲，尤其在法国，社会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其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流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基因结构主义，图海纳（Alain Touraine）、杜贝（François Dubet）、维沃尔卡（Michel Wieviorka）和拉佩若尼（Didier Lapeyronnie）的行动和社会运动社会学，克罗泽尔（Michel Crozier）与弗埃德伯格（Friedberg）的功能主义及策略研究方法，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的方法个人主义。到 80 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吸收了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的建构主义思想，并受到了芝加哥学派以及互动理论范式的影响。最后，从 90 年代起又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劳伦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和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创造的关于正当性辩护的社会学研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共同提出的科技社会学。

当今学界最主流的当属建构主义和释义流派（Berthelot, 2001）。这两种流派与客观主义流派渐行渐远，而这二者则借助个体社会学空间的开创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此外，2000 年以后，在罗贝尔·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杜贝、阿兰·埃亨伯格

(Alain Ehrenberg)、达尼洛·马尔图切利 (Danilo Martuccelli)、博尔纳·拉伊尔 (Bernard Lahire)、德·辛格里 (De Singly) 的努力下,当代个体社会学巩固了自身的地位,阿兰·图海纳和米歇尔·维沃尔卡则潜心于对主体建构的研究。

于是学者在日常生活中每每遭遇范式和方法上的选择难题,他们的世界观、研究方法和治学姿态都会因此而变得多元化。最近几年,学界日益意识到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动态复杂的特性,一种超越二元思想的新认知论应运而生,它似乎全面影响了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虽说韦伯曾经提倡“价值多神论”,但这个想法仅仅停留在了某些学者的美好意愿的简单表述阶段。20世纪70年代,学界有个不成文的共识:由于未经同一套研究程序制约界定,不同范式内的叙事不能互相叠加 (Passeron, 1991)。与那个年代相比,我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我们终于承认科学知识完全可以由不同范式共同建构。

我们知道,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马克思主义逐渐丧失活力,结构主义日渐苍白,而批判思想则变得“超批判”。米歇尔·维沃尔卡 (Wieviorka, 2007) 认为,自那个时代起,欧洲的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四方面重大变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走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主体强力上升,知识分子投身公共空间,中型乃至小型理论获得合法性。

中国社会学家熟稔欧美社会学各种派系,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这些理论或联系或区分,不在学术合法性问题上厚此薄彼。他们所生产的社会学虽然扎根于中华文明的过去和现在,但他们认为社会学诞生于资本主义文明,因此中国社会学也建基于对北美和欧洲(法国)社会学的继承、移植和融合之上。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社会学家谱,当然首属1917年引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后者依然渗透于中国学术争鸣中,与其他理论取向共存。为推介西方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 (Robert Park) 和他的女婿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在1931~1932年和1948年曾两次赴华任教,他们的影响延续至今。

此后，实用主义、符号互动理论、伯格和卢克曼的建构主义、韦伯的理性理论和理解社会学、策略分析、行动者理论（尤其是图海纳的行动和社会运动社会学），都在中国得到发扬。最近几年以布迪厄基因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批判社会学也被中国学界运用。最后，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理论受到当代中国学者的广泛青睐。然而部分顶尖学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社会学家却极少登上中国社会学舞台，参考书目中也鲜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及众多研究当代个体的欧洲学者。

欧洲的社会学舞台上，建构主义影响深远；基因结构主义在布迪厄辞世之后依然活跃；美国学者的论述被频繁引用，实用主义和互动理论在法国学界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布迪厄、图海纳、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哈贝马斯、乌尔利希·贝克、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和安东尼·吉登斯都是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此外，成为各流派继承人的新生代学者也尝试用他们的研究推动不同社会学传统间的求同存异。交互派的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美国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萨斯基娅·萨森、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欧洲学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却罕见中国学者的名字。

在建构国际社会学思想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家试图反思和重读，提出社会事实的特殊性和普世性概念，这就迫使研究者超越西方科学的基本假设（李培林，2008b），并再次提出人的同一性问题（Cai Hua，2008）。于是这里就提出了新的认知学问题：一套科学信仰体系为什么会又如何被另一套体系覆盖？

二 中国社会学：从后殖民到学科重建

中国社会学家一致强调文化、历史、政治背景的重要性——

这些因素构成布罗代尔笔下的“文明事实”（1987）。不过这里的文明背景既可以被理解为昔日中华文明——如关系的永恒作用^①，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下的社会环境。于是根据对文明因素、结构过程、行动、互动和主体性等问题的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现了不同的理论假设。认知层面出现的这种不可预见性发人深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迫切需要将欧美理论迅速纳入中国社会学的建构中，没有时间充分考虑社会学历史上的学术争议以及范式矛盾。

当今中国的社会学中，有的已拥有流派名称，有的尚未冠名。

孙立平（2002a，2007b）称自己的研究是“实践社会学”：“它将社会事实置于动态而非静态中分析，认为实践才是其正常状态，当然它也不忽视结构和制度因素。相反，它要给结构和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以更多的关注。其次，它注重发现事物的逻辑，而这些逻辑在静态中是很难发现的……第三，实践重于静态的结构或制度。”郭于华和孙立平（2002a）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中国农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是为了解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重建，这项研究可谓实践社会学的典范。之后，孙立平又运用实践社会学，提出转型社会是中国特有的“共产主义文明事实”的理论——文明在此被定义为社会生活价值和运作的体系，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东欧国家的经历迥异。再之后，实践社会学和转型社会理论又同时被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变化以及更广义的文明转折点。中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环境就是这种转折，他们在此基础上从事微观社会学研究，分析日

① “关系在中国社会起到重要作用。个体拥有的关系资本事实上已成为个体作为社会成员获得身份的一项标准。它反映个体的能力，凸显行动能力，证明个人在公共空间的尊严。能够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不论其基础是不可逆的亲缘关系或是久经考验的信任关系，并能够将其维持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里，这是获得‘颜面’的来源，即来自社会的尊重……这个词因而只能部分描述中国的人际关系问题，它的工具性使它遮盖今日中国不可或缺但又艰难的一种过程：既广泛又有个别性的信任关系的形成。”（Thireau, 2006）

常生活中的互动和社会实践。

值得关注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无论是研究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和生命力，还是解读历史事件和隐形的社会形态，学者都将结构乃至文明的变迁过程、互动和主体性纳入分析框架中。渐渐地，这些概念之间出现了等级差异，结构性过程和文明过程这两个概念逐渐占据上风。可以推想，之所以这些社会学家重新赋予结构性过程以重要地位，是经济危机使然。不管这种推想正确与否，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库恩意义上的新兴范式。

尚未冠名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语境中赋予结构性过程、实践行动、互动和主体性等因素的地位不同，它们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我们整理出四种视角：

部分社会学对象必须主要用社会结构和文明事实来解释，这就催生了一种新结构主义社会学，例如诸多关于“单位”的研究——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关于同时具有生产和社会功能的劳动单位、经济制度、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包括有关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流动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背景下对策略分析和重构网络的运用，揭示个体和集体如何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多重制约下制定其策略。

以行动者和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关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它认为个体具有解释和反思能力。

以社会主义为背景、以建构主义为灵感来源的社会学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观事实，是非静态的，其定义也非一成不变。这个领域中提出的问题是特定文化背景中个体的建构问题。这一流派的学者认为，在这个正在分层的、社会矛盾和信任危机不断上升的社会中，主体性与“我们”和“他们”的形成有关。

在西方二元思想生产过程中，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客观主